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3.013

身份认同与文学观照

——以宋琬清初江南流寓为考察中心

刘 永 娟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清初时期,文人流寓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宋琬是清初诗词名家,他一生中曾两次流寓江南,尤其是第二次流寓江南时期,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八年,文学书写内涵丰富,情感体验鲜活生动。从起初“江村倡和”的“怨”与“怒”,逐渐到流连山水的居处调适,再到“精神逐步获得超越”的自由与超脱,宋琬逐渐达到一种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和解与建构。宋琬流寓江南的文学书写,不但在清初诗人中显得尤为突出,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此一时期诗人流寓生活与文学书写的总体趋向,反映着士人流寓心态的发展变迁。

关键词:宋琬;江南流寓;身份认同;文学观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3-0089-08

宋琬驰名清初诗坛,王士禛《池北偶谈》将施闰章与他并称“施宋”,谓:“康熙已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1]205-206}可见,清初诗坛盟主王渔洋对宋琬诗的推重。相对于诗而言,宋琬的词数量不多,但亦多为时人称道之作。董俞序宋琬《二乡亭词》曰:“湖海之作,伦父辛、刘;闺帷之制,衙官秦柳。此真子建天人之才,邯郸生能不为之咋舌汗下乎……不朽之道,人患其少,公患其多,岂欲占尽文苑诸家耶?”^{[2]835}由此可见,宋琬诗词兼善,为时人所称美。

宋琬一生丰少屯多,曾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冬十一月,因受恶仆构陷下狱,次年二月出狱。第二次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秋八月,族子宋一炳诬宋琬与山东于七同谋为乱,十一月宋琬全家被下狱。这次入狱,历时两年余,至康熙二年(1663年)十一月,才得以出狱。出狱后,直到康熙九年(1670年)初秋,宋琬一直辗转于杭州、南京、扬州、松江等地,或与友

人泛舟,或湖上唱和,或聚会宴饮,或登高赏景,或送别饯行等,创作甚丰。宋琬流寓江南的文学书写,尤其是其词作,颇为集中地体现了宋琬对社会人事的思考,而目前学界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宋琬的诗歌及词作的风格方面,对其情感体验和人事书写的探讨尚不多见^①。其实,宋琬流寓江南时期的文学书写,折射着他对身边人事的细腻感知与独特体验,相对于宋琬数量众多的诗歌而言,词作亦提供了其对社会人事的重要观照角度与思考方式。

一、劫后余生:复杂心绪的投射

明清易代之际以至清初,是一个特定的时代,诚如严迪昌先生所言,这是一个“心灵颤栗、惊悸徬徨”的时代,汉族士大夫“身临战乱频仍、水深火热的境地,特别是仕途经济的幻梦的破灭、传统相承的宗法的断裂所导致的旧巢已倾、新枝难栖的进退失据的际遇,在广大汉族人民以及各个阶层的士子心头激荡起种种辛酸。悲慨、郁怒、凄

收稿日期:2025-03-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游士叙事视角下的明清小说地图研究”(19AZW014)

作者简介:刘永娟(1976—),女,河南开封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王雨容《宋琬词风变化与“江村唱和”》(《铜仁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白一瑾《宋琬在京城文学活动及其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王欢《论宋琬对“穷而后工”说理论的发展》(《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张蓉《宋琬两次流寓江南的经历与其出处抉择》(《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等。

怆、哀怨、迷茫、怅惶,一股股似风似雨地袭击、紧裹着人们的心灵,而最为敏感的知识阶层则尤其在俯仰今昔之际感慨良多”^{[3]51}。“海内八家之一”的宋琬即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言为心声,不平则鸣”,其寓杭期间的诗词创作,或悲慨郁怒,或凄怆哀怨,或迷茫怅惘,或谐谑自嘲……皆是其劫后余生复杂心绪的投射。这种复杂心绪典型地投射在宋琬杭州“湖上倡和”词和扬州“红桥倡和”词中。

康熙三年(1663年)春三月,宋琬之友王士禄以蜚语遭冤狱数月,被释后流寓杭州。关于此,清初陈维崧《王西樵炊闻厄语序》曰:“甲辰春三月,吏部王先生以蜚语下羈所,越数月,事大白,先生南浮江淮。”^{[4]47}同年,友人曹尔堪“适童奴与县卒角,误触尉怒,尉肤诉长吏,语过激。事闻,坐滴当徙关外。先是君不交公府,当事吏皆多不悦;又自恃无罪,不诣吏求解,故卒坐法,实非其罪也。一时朝士亲交惜君者,争助私钱,用营建例,得赎,无出塞”^{[5]381}。曹尔堪因僮奴与县卒口角而被牵连,坐徙关外,得亲友营救幸免出塞,亦遭放废。康熙四年(1665年)春,三人相遇于西湖,同是天涯沦落人,颇多感慨,遂以《满江红》词调填词唱和,由曹尔堪、宋琬、王士禄首开其倡,后来南北词人参与者数以十计,影响深远,流播甚广,此为清初词坛著称的“湖上倡和”,又名“江村倡和”。康熙五年(1666年),宋琬、王士禄、曹尔堪相聚于扬州之红桥,以《念奴娇》为词牌,填词倡和,各十二首。宋琬、曹尔堪、王士禄三人发起的“湖上倡和”在当时影响深远,以至“同门纸贵”,甚至在两年后,三人相聚于广陵,受前次倡和的影响,又发起了“广陵倡和”(又称“红桥倡和”,实是因为“故人携手”“恰又成三,扬州重见”。可见,“广陵倡和”是“湖上倡和”的赓续,其发起实是“湖上倡和”的导引之功。这两次倡和,宋琬都是主要参与者,选调用韵合乎声情,用典恰切,语言苍古。

(一) 词调选用谐声情

词人选择什么样的词牌进行创作,或出于兴之所至随意选择词牌,或因互相酬唱、次韵而有固定的词牌,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具体到宋琬、王士禄、曹尔堪三人之倡和,词牌的选择,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其选择的必然性,择调作词,前人已

有论述。张炎说:“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6]13}王易《词曲史》:“词调与文情,亦有密切之关系……就词体言,则本律而定调,由调而定声,以声而见情。”^{[7]235}

关于“满江红”词调,岳飞所填《满江红》词几乎家喻户晓,在宋金交战之特殊背景下,其词情激昂,壮怀激烈。龙榆生先生曾对“满江红”词调加以概述,他认为“满江红”词调声情激越,适合表达慷慨之情。此次“湖上倡和”,三先生选择“满江红”词调倡和,确是做到了“赋情寓声,自当求其表里一致”。兹举宋琬此次倡和《满江红·予与顾庵、西樵皆被奇祸得免》词如下:

痛定追思,瞿塘峡、怒涛飞涨。欢北寺、皋陶庙侧,何期无恙。庄舄悲歌燕市外,灵均憔悴江潭上。问终袍、高谊有还无,谁能饷? 愁万斛,东流漾。五噫句,春闲唱。恨埋忧无地,中山须酿。故态狂奴仍未减,尊前甘蔗还堪杖。笑邯郸、梦醒恰三人,无殊状。^{[2]736}

宋琬词上片一开头即以一仄声字领起全篇,振起了激越的感情,接着连用“庄舄悲歌”“灵均憔悴”之典故,表达慷慨悲歌之情。下片用“中山须酿”和“邯郸梦”的典故表达劫后余生之惊悸不安。“这是顺康之交汉族士大夫在新朝廷上动辄得咎,所处境况极险谲的必然性表现……掺和着余悸和庆幸,隐寄以怨愤和颓伤,表现为对尘世的勘透,但求于山水中颐养劫后余生,这就是‘江村唱和’几个层次的内涵。”^{[4]53}此次唱和选择“满江红”词调,就唱和的效果而言,做到了“由调而定声,以声而见情”,可谓一次成功且影响深远的词坛唱和。

(二) 用典恰切,语言苍古

诗词中每有委曲之意,不能直达,乃引故实,借以影喻,所谓用典是也。钟嵘《诗品》序云:“夫属辞比事,乃为通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8]10}这里,钟嵘强调了用典的重要性。典故包括历史典故、文化典故、前代诗词的引用或化用等。《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9]1407}所谓“援古以证今”,实则即是用古事或成语委婉曲折地表达作者的情思。但典故的运用一定要切合作品

的语言环境,要运用恰切,实为不易。张炎《词源》曰:“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6]20}宋琬“红桥倡和”词用典恰切,用语苍古。如宋琬现存“红桥倡和”词《念奴娇·丙午小春善伯希韩招诸同人宴集红桥之韩园分韵》:

玉钩斜畔,最伤心、游子断肠难续。
佳丽繁华谁领略,惟有清狂杜牧。我辈
重来,为欢苦短,急办三条烛。天寒木
落,佳人同倚修竹。况乃词客都豪,
雍容车骑,落笔云烟簇,乐莫乐兮今夕
会,莫学阮公痴哭。绿酒黄橙,银箏翠
袖,偷送初成目。朦胧别后,知他何处
金屋。^{[2]736}

这首词用语苍凉古朴,词情凄凉中饱含激越。正如秦留仙评曰:“上半阙朱楼碧草,烟雨迷离,下半阙堕珥遗簪,惊心动魄。”尤其是“清狂杜牧”和“阮公痴哭”典故的运用,一唱三叹,贴合红桥倡和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蕴涵。所谓外部环境,是指红桥倡和的地点在扬州之红桥。扬州自古繁华,风流才子杜牧在此留下诸多佳话。“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可以说,杜牧是扬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佳丽繁华谁领略,惟有清狂杜牧”,这里用杜牧的典故,正是契合了红桥倡和之文坛风流雅事的外部环境,如龚鼎孳《红桥倡和第一集序》曰:“名园曲树,宜贮佳人;废苑荒台,每来词客。则此集也,洵江山之盛事,而骚雅之极观哉。”^{[10]2131}下半阙“乐莫乐兮今夕会,莫学阮公痴哭”,用“阮公痴哭”之典故,反衬出倡和之内在蕴涵的复杂。王勃《滕王阁序》曰:“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阮籍经常驾着马车四处游荡,行到穷途,放声大哭,边走边哭,边哭边走,所谓恨知音少,穷途末路,生不逢时,抱负难申是也。宋琬此词用典恰切,用语合乎声情,红桥倡和,参与者甚众,各家经历不同,心绪各异。尤其是宋琬,经过此前湖上倡和之“怨怒”之情的宣泄,于红桥倡和时期,心态已然进入对此前入狱之痛的选择性遗忘阶段。

二、笑傲烟霞:流寓生活的自我调适

宋琬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康熙二

年(1663年)第二次出狱后已年届五十。所谓“五十知天命”,经历了宦海风波和图圉之难的宋琬,对人事风物皆有清醒的认识。总体上看,除了“怨”且“怒”的“罪官”“废人”之激烈心绪外,更多的是笑傲烟霞的自我调适。风雨漂泊、辗转流离之后,置身于江南的清初文人需要江南的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来洗涤心尘,安放疲惫的身体与心灵。多年的江南流寓生活,宋琬是如何调适自己的心灵的呢?

(一)山水疗愈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文人雅士与山水人文,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江南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永嘉之乱”之后,晋室南迁,大批知识分子和世家大族萃止江南,使得江南成为人文渊薮。江南之地在人们心目中,山水清佳,人物英俊,“其山崿嶭以嵯峨,其水泝濞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11]86},小桥流水,溪畔人家,杏花微雨,山水如画……江南,浸润着中国人的诗意,满足了士人对于佳山秀水的幻想。

对于流寓江南的宋琬来说,纵情山水的确可以疗愈其长期入狱之痛。“系缆芙蓉岸,舟人指翠微。却携青箬笠,来款白云扉。夏木莺声接,高楼山气归。隔篱精舍晚,清磬满鱼矶。”“曾闻丘壑美,悔不及春游。正欲寻源去,何妨为雨留。绿萝宜冒目,红叶不同秋。叹息浮家客,飘摇愧野鸥。”(《东园二首》)^{[2]220}这两首诗清新淡远,读之令人忘忧。戊申六月朔三日,宋琬从杭州涌金门出发游西湖,见奇云,遂作《湖上奇云记》:“立者如鹤,飞者如鸾。植而高者,如羽葆之罕;舒且卷者,如九旂之旂……山之麓,有崦有峪,有壑有塍,有似田家篱落者,有似酒帘之摇曳者,有似猗猗之断续者,纷纶倏忽,变幻俄顷,虽王维、荆浩殆未能图绘其仿佛也”^{[2]434}。云之起也,气象万千,“为停舟良久……归而蚊蚋盛集,不可以寐,乃呼童子执烛而画其异”^{[2]434-435},白天赏其不足,入夜尚画其貌,其纵情山水若是。

但这种借湖山调适的心情又是复杂多变的。宋琬《约同友人九日登高启》:“江涵秋影,白雁书天;菊放疏篱,黄花匝地。屈授衣之令序,易起羁愁;感落帽之佳辰,雅宜胜赏。登高望远,有林处士之孤山;击汰扬舲,寻白香山之古埭。烟寒橘

柚,交加水面楼台;鬓插茱萸,映聚天涯兄弟。台空戏马,重吟宣远之诗;目送归鸿,共抚嵇康之操。歌成白苧,无劳急管繁弦;醉洒乌程,试看长林落叶。愿携襆被,信宿山阿。”^{[2]503}这里首先写了重阳时节,西湖之美,邀友人登山远望,可以看到林逋隐居的孤山,乘着船在水中荡漾,去寻找白居易曾经游览过的古埭,为登高望远和泛舟寻古增添了文化色彩。而“鬓插茱萸,映聚天涯兄弟”,让人不禁想起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在家乡的兄弟,会不会想起我呢?登临山水之余,羁旅之愁油然而生。而且,结尾处提到了嵇康——西晋名士嵇康被人诬陷至死,临刑前,面对生死从容不迫,他抚琴一曲《广陵散》。宋琬提及嵇康,似是隐喻自身的无辜被祸。

(二)交游忘忧

宋琬乃清初著名诗人,与宣城施闰章称“南施北宋”,与沈荃、施闰章、曹尔堪、王士禄、王士禛、汪琬、程可则并称为“海内八大家”或“清八大诗家之一”,又是“燕台七子”(施闰章、宋琬、丁澎、张慎明、周茂源、严沆、赵锦帆)之一。宋琬平生交游广阔,“故废者八年,公侨居吴门,年过五旬始……日与骚人逸客徜徉于诗酒山水间”^[12],与清初诗坛名家龚鼎孳、王士禛、王士禄、施闰章、尤侗、曹尔堪、陈维松、方文、汪懋麟、丁澎、田雯、梁清标等皆有唱和。

“伏枕南屏寺,闻君脱罽罗。翻然具舟楫,及此问烟萝。惊定收双泪,悲来著九歌。惠连新句好,惆怅未同过。”“惜别魂犹悸,相逢病欲苏。全身来北寺,留眼看西湖。白社期同往,青山道不孤。故人曹邴在,吟眺慰穷途。”^{[2]503}(《喜王西樵至湖上二首》)“湖上莺啼早,人来归雁初。登临欣并屐,货殖续成书。弱柳垂疏槛,游鱼出碧渠,不逢渔父关,谁识楚三闾。”^{[2]503}(《和曹顾庵湖心亭作》)此乃与友人出游之唱和篇什,又有祝寿、题画、送别、赠序、宴饮之作等。如在扬州时作《贺新郎·为龚芝麓寿》词、《送龚芝麓起复还京》诗、《题王西樵西湖竹枝词序》等。由此可见,宋琬在流寓江南时期的交游活动非常丰富,他与当地的文人墨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不仅使其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慰藉,也帮助他缓解了牢狱

之灾带来的心灵创伤。

(三)隐逸超脱

宋琬之父宋应亨系抗清义士,且死于抗清守城之战,而身为人子的宋琬,面对国恨家仇,缘何能安心仕清?走上仕途后,如履薄冰,后又两次入狱,尤其第二次入狱,“今一妄男子飞章告密,株连逮于戚友,草索施于童稚”^{[2]501-502},狱中的生活,更是“圜扉幽暗,白日无光。击柝之声,不绝于耳。夏则蚊蚋攒集,郁蒸湫湿,坐起靡宁,拘挛腿肿。今兹盛寒,百倍于外,雪窖冰天,未足为喻。桔拳荷校,累累满前,朝为要囚,夕为历鬼”^{[2]502}。出身莱阳望族的宋琬,“平时偶遇道瑾,辄掩目不敢逼视”^{[2]502},经历非人的牢狱生活之后,而今“恬不畏矣”。宋琬还曾作《蝉声赋》《狱中之羊赋》以记其事:“余以牢修之灾,淹系西曹,践朔雪以来思,闻秋飏而未去。摧残槁木,羨亭树之依依;辛苦蓼虫,感鸣蛩之哆哆。”^{[2]456}这样的经历,对宋琬来说,是尤其残酷的,所受打击亦是痛彻心扉的,出狱后客居异乡,经历了非人的牢狱生活,其作品中明显可见沧桑之感和避世之思。

如《念奴娇·重过汪氏荣园》:

辟疆池馆,是谁剪、瓜步江流余汜。
放逐余生双不借,重看水穷云起。怪石崢嶒,孤亭窈窕,萝薜藏山鬼。行行且止,呼童为摘苍耳。堪叹沧海桑田,洛阳金谷,转眼荆榛里。舞榭歌台真可可惜,愁杀乌衣燕子。百顷清潭,十围灌木,桐又生孙矣。故人携手,为言树犹如此!^{[2]746-747}

“洛阳金谷”指的是晋代石崇的金谷园,以豪华富丽著称。后来金谷园荒废,成为历史的遗迹。乌衣巷曾是东晋王谢等世家大族的聚居地,“乌衣燕子”象征着昔日的繁华和贵族生活。“树犹如此”出自桓温北伐时的典故,他看到自己早年栽种的柳树已经长得十分粗壮,感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汪氏荣园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园林,但在时代的变迁中,也难逃衰落的命运。宋琬重过此地,看到园中的“怪石崢嶒,孤亭窈窕,萝薜藏山鬼”等景象,园林的荒芜、破败与记忆中的昔日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今昔对比,让词人不禁联想到人生的无常,进而引发了他“堪叹沧

海桑田,洛阳金谷,转眼荆榛里”等诸多感慨,于是挥笔写下了这首词,以表达对历史变迁、人世沧桑的深沉悲哀和对人生的思考。

图圉余生,放逐江南,八载寒暑,“饥来驱人,携家三泖。譬彼浮云,茫无根蒂。客子之苦,良足悲也。”^{[2]605}宋琬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发生了巨大改变: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进取精神逐渐为道家的虚空梦幻意识所取代。如《满江红·铁崖顾庵西樵雪洲小集寓中看演邯郸梦传奇殆为余五人写照也》:

古陌邯郸,轮蹄路、红尘飞涨。恰半晌、卢生醒矣,龟兹无恙。三岛神仙游戏外,百年卿相蓬庐上。叹人间、难熟是黄梁,谁能饷? 沧海曲,桃花漾。茅店内,黄鸡唱。阅今来古往,一杯新酿。蒲类海边征伐碣,云阳市上修罗杖。笑吾侪、半本未收场,如斯状。^{[2]738}

这首词小序中说,词人和曹尔堪、王士禄等友人看《邯郸梦》传奇,五人经历相似,皆是劫后余生,由看戏而思及自身,同病相怜,感同身受。宋琬此词明显可见之隐逸超脱之思。

宋琬在《题王西樵书金刚诸品经后》说:“辛丑冬,予以族子告密,槛车征诣北阙,有诏付诸司败,颂系庠下者二年……居亡何,竟用举子试卷微眚,待直爽鸠外署……今虽懂而得免乎,一追忆焉,不啻惊涛沸鼎……虽然铁围剑树,瞬息清凉,富贵荣名,有同泡影。惟吾两人方当了悟,大事因缘,不烦转念。”^{[2]517}宋琬和王士禄二人均曾入狱,忆及前事,不啻惊涛骇浪。得释后,二人相遇于江南,惺惺相惜,不胜唏嘘。王士禄借书佛经以求得心灵的宁静,宋琬见之,避世隐逸之思油然而生,题之表达相似之感慨:荣华富贵如同泡影,唯有了悟前尘旧事,才可不被烦恼袭扰。

三、身份认同: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脱

宋琬出身官宦世家,其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有激烈的政治抗争。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兵南下围莱阳,宋琬之父宋应亨散尽家财修复瓮城,招募死士组织防御,率领族人拒守,城破而殉国。由于特殊的家世背景,宋琬和同一时期的王士禄、曹尔堪等士人流寓江南除有一定的共性之外,亦

存在个性差异。三人都经历了仕途挫折和人生磨难,在江南的山水中寻求慰藉,以诗词唱和排遣心中的郁闷,但由于宋琬身被国恨家仇,所受打击较为严酷,因而内心所受创伤亦较为深重,因而作品中时见“罪官”“废人”之激烈怨怒,感情较为外露。

(一)“罪官”怨怒之情的宣泄

流寓江南时期,宋琬作品中时露激愤之情。如在与曹尔堪、王士禄等友人的“湖上倡和”中,他直抒其“罪官”“废人”的怨怒之情,以宣泄内心的愤懑。康熙四年(1665年)春,宋琬、王士禄、曹尔堪三人相遇于西湖,发起湖上倡和。关于湖上倡和,清初毛先舒《题三先生词》曰:“始,莱阳宋夫子为浙臬,持宪平浙,以治未一岁,而无妄之狱起。既而新城王西樵、吾乡曹子顾亦先后以事或谪或削,久之得雪。今年夏月适相聚于西湖,子顾先倡《满江红》词一韵八章,二先生和之,俱极工思,高脱沉壮,至其悲天悯人,忧谗畏讥之意,尤三致怀焉而不能已。呜呼,何其厚也。”^{[13]639}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说:“‘江村’唱酬是当时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迁谪之客的感受的一次大抒发,故有著时代印记,绝非出于闲情逸致。”^{[3]53}此次倡和,宋琬填《满江红》词八首,“杨恹南山歌太苦,邹阳北阙书难上”^{[2]737}“请室耗,心旌漾;击瓦缶,乌乌唱。看霜侵两鬓,穷蒸愁酿。放逐谁怜亭伯困,登临愿借卢敖杖。”^{[2]737}在词中,直抒其“罪官”“废人”的怨怒之情。

相比于词,宋琬在诗中的情感表述更为直接愤慨,如《写哀》(五首):

其一

幽愤嵇中散,悲歌楚左徒。
余材诚不逮,其事若相符。
莘莘嗟男子,申申詈女嫗。
巫咸渺终古,风雨閼难呼。^{[2]224}

其二

憔悴南冠系,凄凉北寺门。
冻云添夜哭,怪鸟下朝暾。
百代皋陶庙,前朝李杜魂。
欲排阊阖问,虎豹一何尊。^{[2]224}

“幽愤嵇中散,悲歌楚左徒”,诗人以嵇康、屈原自比,暗示了自己如同他们一样蒙受不白之冤。

“余材诚不逮,其事若相符”进一步强调自己虽然才能不及古人,但遭遇相似,加重了这种怨愤的情感色彩。“百代皋陶庙,前朝李杜魂”,诗人借皋陶庙和前朝李杜之魂灵,表达了对公正和正义的渴盼以及对所处时代的不满。“憔悴”“凄凉”“夜哭”,进一步强化了怨怒之情。

(二)感怀家国的遗民之思

宋琬第二次流寓江南时期,经历了最初“江村倡和”时期的“罪官”“废人”之“怨与怒”的情感宣泄,随着时间的流逝,悲愤郁勃之情绪渐趋平静,遗民之思时而显现。明清鼎革之际,家乡莱阳遭遇战乱,宋琬父兄死于抵御清兵的战役之中。漂泊时期,他内心始终牵挂着故乡,如《余家海上,有林园山墅之乐,自逢多故,仅有存者,十年之间,未尝一日棲焉,岁时犹尽,睇我旧居,作《故山诗》六首,其一:“汨汨哀时序,悠悠思故山。敝庐沧海曲,荒径翠微间。幻梦惊藏鹿,狂歌欲放鹞。年年芳草绿,惆怅未能还。”^{[2]227}诗人开篇直抒胸臆,以“哀”字奠定了全诗悲伤的基调,感慨时光的流逝,悠悠岁月,故山家园始终令人魂牵梦萦。“按照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伦理结构,通常由此衍行为以乡土—国家—民族的序列结构,于是作为包容性极强的‘家园情结’已然包括了‘故土’‘故乡’‘民族’‘国家’等多种空间情感”^{[14]543-544}。故园里的一草一木,承载着诗人过去的生活记忆,是故国的象征,往事如烟如梦,现实依然残酷。“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诗人希望像鸟儿般飞越千山万水,回到故乡的怀抱,可因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回归故园。

宋琬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出身官宦世家,明朝灭亡后,他虽出仕清廷,但因父亲抗清之事以及被人诬陷与农民起义领袖通谋造反被捕入狱。这种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坎坷遭遇,使他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无奈。明清易代前后,宋琬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一些遗民或具有遗民思想的人,如方文、吴梅村、张瑶星等。然而,与那些坚决不仕清廷、以遗民自居的诗人如顾炎武、王夫之等相比,宋琬的情况较为特殊。他出仕清朝,在立场上与纯粹的遗民有所不同。但由于家庭背景、个人遭遇以及所处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在流寓江南时期的作品中亦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一

些与遗民之思相关的情感和思绪,如其《悲落叶》:“悲落叶,落叶纷相接。无复语流莺,飘摇无黄蝶。朝如繁华之佳人,夕若靡芜之弃妾。因风起,从风飞。放臣羁客那忍见,攀条揽捩空沾衣,徘徊绕故枝,柯干长乖违。凛凛岁云暮,此去将安归?悲落叶,伤心胸。原因征鸟翼,吹我到乡中。”^{[2]169}这是一首杂言歌行体咏物诗,“朝如繁华之佳人,夕若靡芜之弃妾”暗喻自己生活的遽然变化:从风华绝代之佳人到愁容惨淡之弃妾,改变的不仅是外在的容颜,更是心灵的无所皈依。“原因征鸟翼,吹我到乡中”,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此处的“乡”不仅是指地理上的故乡,更象征着诗人心中的故园故国以及往昔之平静生活。他渴望能够像征鸟一样,振翅飞回故乡,回到那个让其感到安心和熟悉的地方。

(三)“逸民”身份的认同

流寓江南,徜徉山水之际,宋琬亦逐渐认同自己被放废之逸民身份。远离故乡,四处漂泊,宋琬内心满是孤独和凄凉。他身如浮萍,四处寄寓,与故乡的亲人和旧友分离,这种身世的漂泊让他渴望回归故乡,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只能在孤独中以逸民自处,逐渐以逸民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和表达情感,抒发内心的无奈。如《旧雨来·自度曲,客金陵雨中作》:

曾记当年雨后,门前冠盖客,一何多!银烛西窗萤火乱,听枯荷。直到晴时方去,湿鸣珂。

今日雨声犹昨,萧条三径里,有谁过?料得故人无疾病,却因何?只把天公埋怨,太滂沱!^{[2]732}

上阕回忆当年雨后宾客盈门,夜晚西窗秉烛听枯荷之情景。下阕笔锋一转,“今日雨声犹昨,萧条三径里,有谁过?”如今同样是雨天,门前却无人问津,暗示诗人如今已处于放废之境,成为被冷落的逸民,这种对比鲜明地体现了诗人人生境遇的巨大变化。“料得故人无疾病,却因何?只把天公埋怨,太滂沱!”表面上是埋怨天气,实则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渴望故人能来与自己相聚,排遣寂寞;另一方面,又深知自己放废的处境,故人或许是因为种种原因不便或不愿前来,所以只能借埋怨天公来抒发内心的

无奈和失落。这种放废之逸民的心态,既有对自身境遇的无奈接受,又有对往昔人际关系的留恋和对现实人情冷暖的感慨。

从康熙二年(1663年)冬十一月初三出狱后流寓吴、越,至康熙九年(1670年)秋北上京师,宋琬流寓江南长达8年之久,在日复一日的流寓生活中,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诗人之心情逐渐趋于平静,已然认同自己的逸民身份,转而于日常生活中寻觅诗情,安放辗转漂泊之心灵,寻求心灵的宁静自由。如《庚戌元旦》二首其二:“龙角苍苍斗柄横,春风吹满阖闾城。醉来藟蔗还堪杖,客到芜菁尚可羹。种秫田逢雀鼠耗,采菹社与鹭鸥盟。梅花风约今须践,驴背何辞冒雪行。”^{[2]275-276}《元日祀先大夫儿辈相随拜跪颇能成礼喜而有作》二首其一:“华发支离叹鲜民,椒觞独荐每沾襟。松楸又历三冬雪,俎豆新添一辈人。拜舞宛依严父膝,登临能掖老夫身。明年小塾谁先入?篋里遗经为两陈。”^{[2]276}

如果说流寓之始的湖上倡和时期,宋琬作品中多见悲慨怨怒之情,那么,到康熙九年,时经八年的辗转流离,其作品中这种怨怒之情已然被磨砺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逸民身份的深度认同与和解,表现在作品中的,则是与自然及人事的和谐相处,以甘蔗为杖、芜菁作羹、骑驴赏梅,儿辈的茁壮成长亦深慰其心,处处可见宁静心绪的流露与表达,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

宋琬一生丰少屯多,困顿、痛苦、坎坷、凄凉才是其人生的主题词。他早岁困蹶科场,屡试不第,在同窗大都已云霄展翅之时,他却偏偏青云折翼。避乱逃亡途中的渔火刀戈;而后小人诬陷、仇人迫害;又仕途坎坷,从官场到囹圄,天壤之别。知天命之年流寓江南,飘泊之感,客子之悲,痛彻心扉;大起大落,浮沉不定,起落间积极用世之心渐渐消磨为归隐之志;最后花甲之年于惊悸中死于京城客舍,连国人重视的传统的寿终正寝都没能做到,非“凄凉”二字所能道也!

出身莱阳望族的宋琬,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达则兼济天下”,追求功名是其应然选择,但在清初那个汉族士大夫动辄得咎的特定时代,加之其特殊家世背景,其仕途蹭蹬、命途多舛似乎又是

某种必然。通过对宋琬江南流寓经历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清初那个特定时代,虽说诗人的际遇多舛,但其应对人生苦难的方式是积极的。宋琬在流寓过程中,虽然经历了痛苦和磨难,但逐渐认同了自己漂泊者的身份,“流寓者在流寓地时日既久,会慢慢地与流寓地“同化”,认同自己流寓者的身份,精神逐步获得超越”^[15],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对创作的热爱,其诗歌创作在流寓期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其友人方文在《喜晤宋荔裳观察四首》其二中所言:“频年忧患两寅同,却讶诗文转更工。”^{[2]853}“漂泊首先是一种生存状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漂泊;一种是心灵上的漂泊。后者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人生境界。”^{[14]534}在长期的流寓生活中,宋琬积极与其他文人交流,融入当地文人生活群体,努力在困境中寻找精神寄托。而他流寓江南的文学书写,从“罪官”“废人”的怨怒之情、饱含沧桑的遗民之思,到“精神逐步获得超越”的宁静与超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体现出多维的人事体验与自然认知,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流寓生活的缩影。

同是流寓者的身份,离散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项重要议题,关于其移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建构,亦同样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具有流动性的身份认同,经历着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协调,成为解决移民身份建构的有效策略之一。主体随着时间的推进获得不同的身份,不再以一种统一的模式为中心,而是既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又将这种影响扩散于四面八方,形成不断变动的过程”^[16]。宋琬应对流寓生活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的样本,启示我们:无论我们身处何地,生活中总有很多摆脱不了的困境,我们应积极寻找与内心和解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拒绝内耗,享受当下。

参考文献:

- [1] 王士禛.池北偶谈[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2] 宋琬.安雅堂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3] 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4] 陈维崧.陈维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0.

[5]施闰章.施愚山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2.

[6]夏承焘.词源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7]王易.词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龚鼎孳.龚鼎孳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3.

[12]宋磊,范韶华,孙钰玮.宋琬墓志考[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9).

[13]毛先舒.溪书[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10).济南:齐鲁书社,1997.

[14]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5]张学松.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以柳宗元流寓书写为中心[J].江汉论坛,2021(10).

[16]缪菁.离散批评与文化身份认同的持续性策略——以美国华人文学为中心[J].学术论坛,2014(11).

Identity and Literary Visulization: Centered on Song Wan's Exile in Jiangn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U Yong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exile of literati was a prevalent phenomenon. Song Wan, a renowned poet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exiled to Jiangna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wice in his life. Especially during his second exile spanning eight years, his literary creations were rich in content and vivid in emoti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initial “resentment” and “anger” in the “poetic exchanges in Jiang Village” to the gradual adjustment of living conditions while lingering among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en to the “gradual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characterized by freedom and detachment, he gradually achieved a reconcili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his self-identity. Song Wan's literary writings during his exile in Jiangnan stand out among the poet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represent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exile life and literary writings of poets during this perio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exile mentality of scholars.

Key words: Song Wan; exile in Jiangnan; identity; literary visulization

(责任编辑 陇 右)